



张鹏伟◎著

天理与人欲的历史蕴含与现代意义



人民出版社



89
4-4
张鹏伟◎著

天理与人欲的历史蕴含与现代意义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理与人欲的历史蕴含与现代意义/张鹏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1-019145-4

I. ①天… II. ①张…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宋代②理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244.05②B24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3069 号

天理与人欲的历史蕴含与现代意义

TIANLI YU RENYU DE LISHI YUNHAN YU XIANDAI YIYI

张鹏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11 千字

ISBN 978-7-01-019145-4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项目资助：本书获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与价值研究院出版项目的资助。

序

郭齐勇

张鹏伟博士曾跟我读硕士，毕业后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教，之后又跟随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是农家子弟，家境贫寒，求学之路颇为艰辛。在武大求学期间，他好学善思，勤于钻研，受到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和浓厚的理论钻研兴趣。本书是作者在2013年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宋明理学天理人欲问题研究》答辩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充实而成的作品。我读后的总体感觉是，本书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天理与人欲的历史蕴含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索，对五四以降权威的、常见的对于天理与人欲的误读和误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其概念的基本涵义及其历史演变作出了内在同情的辨析与解读。

本书的特色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作者注重将文献解读与理论重构相结合。全书以文献的考证、梳理和基本概念的辨析为基础，以问题的逻辑展开为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上古的天人关系以及天理和人欲的历史蕴含，分析了天理人欲之辨之所以展开的思潮背景、理论渊源，梳理了天理人欲与义利王霸之辨的内在关联，并从当代社会现实的角度反思了天理与人欲的具体表现及其现代意义。在该书中，作者对道德本体与伦理纲常的区分，对理学诸家本体论思路及其差异的分析，也体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及其理论重构的尝试。比如作者提出的主体性存有论和客体性存有论的解读框架，较具新意，可供学界进一步讨论。

其二，作者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概念和问题的发​​展脉络。宋明天理人欲之辨既包含微观层面的概念之澄清，也包含着宏观层面的宋代

儒学再造运动的社会思潮背景。作者在解释概念时,既能从大的时代背景来审视概念的特定蕴含,比如在分析天理和人欲的涵义时,就将其放在宋初儒学复兴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关怀的层面来把握。同时,在分析宏观的思想史问题时,又能聚焦到天理与人欲关系这个关节点上进行具体入微的辨析。作者认为,天理人欲之辨并不仅仅是一对概念的关系之辨,而是关联着两宋儒者对于道统和治道的深层关怀,是儒家内圣外王相统一之理想和信仰的整体体现。作者认为,天理人欲是贯通内圣与外王、道学与政事的一对范畴,并贯穿整个理学的道德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是联结其他范畴的枢纽和桥梁。作者这样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和现实关怀的关系。

其三,作者比较注重古今视域的融合,但又注意防止古今视域的含混与相互排斥。比如作者在分析天理与人欲的历史蕴含时,尽量排除当代视域的干扰,努力追求一种原汁原味式的理解。同时,在阐发天理与人欲的历史反响及其当代意义时,既注重当下的现实需要,同时又能注意理论的现代转化及其运用边界。作者的这种双重追求,既避免了盲目的古为今用,也避免了先入为主的以今释古。作者是在努力追求一种同情理解和内在诠释的统一,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四,本书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也较为充分地吸收和参考了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广泛借鉴与充分吸纳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不一味盲从,而是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对一些权威性的说法提出了有理有据的驳正。

作者在武大求学期间,勤奋谦虚,敬业乐群,尊敬师长,积极任事,在人格与学问方面得到了成长与锻炼。到西安工作以后,又奋发进取,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在丁为祥教授的指导下进德修业,学问也有了新的进步。我很高兴看到鹏伟的博士论文得以出版,也衷心祝愿鹏伟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郭齐勇

2017年10月6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天人关系论	14
第一节 “天”的含义	15
一、“天”的字源意义	15
二、“天”的观念意义	16
第二节 关于“天”的各种语词及其内涵	19
一、天命	20
二、天道、天德、天心	22
第三节 原始儒学天人合一的两种进路	28
一、《中庸》、孟子的天人合一论	28
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	32
第四节 天人相分论	33
第二章 天理论(上)	36
第一节 先秦文献中的“天理”	36
第二节 理学中“天理”的含义	39
一、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形上学	41
二、存有之理、存在之理、形构之理	44
三、道德本体与伦理规范	47
第三节 “天理”道德本体论的创立	51

一、邵雍的“象数”	52
二、周敦颐的“诚”与“太极”	54
三、张载的天理、天德与太虚	57
四、程颢的“天理”	65
第四节 天理的不同存有	69
一、本体论上“体用”范畴的三种进路	70
二、理学的视角及其判定	75
三、主体性存有论	81
四、客体性存有论	85
五、主体性存有论之发展——王守仁“良知”本体论	99
第五节 天理的两个层次	103
一、二程的“天下善恶皆天理”	103
二、朱子“天理”的不同内涵	105
第六节 天理总论	107
一、天理的超越性、内在性和普遍性及其统一	107
二、天理的存有和实现方式	109
第三章 天理论(下):天理与人性	111
第一节 理学之前儒家人性论的发展	111
第二节 理学人性、人心论的不同思路	117
一、主体性存有之性、心	119
二、客体性存有之性、心、情	123
第三节 性、心、情总论	143
一、四端与七情	143
二、性、心、情的关系	144
第四章 欲与人欲论	147
第一节 先秦儒家“欲”的基本观念	148

一、孔子的“欲”论	148
二、孟子的“欲”论	150
三、荀子的“欲”论	159
第二节 道家、道教的“欲”论	163
一、老子的“欲”论	163
二、庄子的“欲”论	165
三、道教的“欲”论	168
第三节 佛教“欲”论概说	169
第四节 理学中人欲、私欲的基本含义	171
一、欲、慾、人欲	174
二、“人欲”的内涵与层次	175
三、朱子的“人欲”论	185
四、陆九渊的“欲”论	188
第五章 天理人欲之辨	191
第一节 天理人欲之辨的社会历史渊源	191
一、宋代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士人的崛起	191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193
三、两宋士林风习的嬗变	194
四、“天理人欲之辨”的现实关怀	196
第二节 天理人欲之辨的思想渊源	201
一、来自佛教本体论的批评	201
二、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超越	203
第三节 朱子的天理人欲之辨	206
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	207
二、天理从人欲中见	211
三、天理人欲不并立	213
四、天理人欲与善恶	215

第四节 天理人欲关系总论	216
一、体用关系	217
二、源流关系	220
三、存有关系	221
第五节 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路向	224
一、理学工夫论的奠基	224
二、主体性存有之工夫路径	230
三、客体性存有之工夫路径	234
四、王阳明的工夫论取向与演变	238
第六节 天理人欲之辨的历史衍化	243
一、理学的官方化与天理人欲观的异化	243
二、明清之际哲学视角的转换与天理人欲观的嬗变	248
三、戴震批判理学“以理杀人”的理论得失和社会效应	267
第六章 天理人欲与义利王霸之辩	272
第一节 天理人欲与义利、王霸	272
一、天理人欲与义利	272
二、天理人欲与王霸	276
第二节 朱子、陈亮王霸之辩	280
一、朱子和陈亮的辩论始末	280
二、价值超越视角与历史实然视角的关系	291
三、从朱子和陈亮各自的视角看三代与汉唐的关系	293
四、道尊于势——朱子坚持价值超越视角的深度关怀	295
第七章 天理与人欲的现代意义	297
第一节 天理人欲之辨与宋明理学	298
一、作为宋明理学兴起的思想关怀和价值指向	298
二、作为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	299

第二节 修养工夫与当代人生境界	301
一、古今道德修养之同异	301
二、圣贤气象与人格精神	302
第三节 民族精神与当代人生信仰	303
第四节 天理与人欲的现代表现	305
一、天理与人欲的中间地带	305
二、天理和人欲的背反	308
三、天理和人欲的评价维度	311
第五节 天理与人欲的运用边界	313
一、思想误读的原因	313
二、天理人欲的运用边界	316
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5

绪 论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走过了崎岖坎坷的道路。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和思想启蒙的文化诉求,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在中西古今两个坐标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把脉和诊断。在此过程中,由于情急势迫,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变法图强,急于采他山之石以攻自己之玉,所以不免在思想方法上表现出简单化、极端化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化等倾向。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及其造成的历史影响,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简单化、极端化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文化观,主要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坐标上。

首先,在“中西”这个空间坐标上,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抗争事实,极大地刺激着国人的神经和自尊心,天朝上国的迷梦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变而为向西方学习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经过了几十年对西方先进军事、政治制度的学习,最后仍然收效甚微。这样一来,西方之所以先进的原因就只能在文化上去追寻了。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便成为思想启蒙的两大法宝。既然中国落后的原因找到了文化上,那么与社会现实的落后相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教”等批判传统文化的口号便成为当时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潮流。与之相伴随和映衬的是“全盘西化论”的提出。打倒落后的传统之后,中国在文化上也就只能走全盘西化的文化道路了。显然,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以落后和先进之两极来对中西文化对号入座了。这在当时自然有不得不如此的社会历史情境。但这种简单化、极端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来说,其礼乐制度和礼乐精神难道仅仅具有吃人的一面吗?礼乐教化有没有养人的一面呢?西方文化就是全盘先进的吗?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情境下,既无暇顾及,也很难进行客观冷静的反思和判断。

其次,从“古今”这个时间坐标来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本来是用来解释自然界生物和物种的演化的。但在民族生存深陷危机的特定背景下,进化论的影响也就必然会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生存方面。进化论不仅被用来解释自然界的演化历程和演化趋势,而且也被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这在当时对于唤醒国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和奋起抗争意识,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用这种观点简单地来看待古今之变,则会将古今之异看成是落后与先进之异。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也就必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的,现代一定比古代进步,未来一定比当下进步。以社会进化论的单线条进步观来看待人类的文化,那么也会认为人类思想文化是不断进步的。古代文化必然落后于现代文化,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必然要排斥和斩断传统。这就又在时间坐标上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像“破四旧”等种种割断传统脐带的行动,就极端地表现了这一思想的误区。之所以说是误区,是因为人类文明和思想的进步,并非单线条的一种必然性,而是多维的、交错的、立体的。文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可能是进步了,但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或者在其他方面反而是退步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就必然会带来精神文明的进步吗?不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批判了文明的负面效应,如老子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当以落后和先进对古今文化来对号入座时,所谓的传统文化也就必然被作为糟粕而被横扫了。但当我们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还能剩下什么?民族精神的认同、民族的精神家园何处寻?

时空坐标上的这两种文化观其实是同一思维模式的不同表现而已。在21世纪的今天,站在新的思想视野上,这种极端化、非此即彼的二元文化观的局限性更加显露无遗。任何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可大可久,就必须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传统,并非已经死去的历史陈迹,而是至今活着的文化

生命。”^①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接续我们自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鲜活的文化生命,成为当代中国人重要的历史担当,这也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修课。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接续文化生命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就首先需要从方法论层面予以深刻反思。

一、以今释古与视域融合——方法论的反思

关于对待传统的态度,多年来理论界有一个通行的约定俗成的说法,那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说法当然也对,但不能笼统言之。因为在深入了解和准确解读传统之前,怎么可能清晰地辨别传统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呢?怎么可能保证取的一定是精华,而去的一定是糟粕呢?就拿本书要探讨的主题来说,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或“存天理灭人欲”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呢?如果不深入宋明理学的具体语境,仅仅从字面上顾名思义的话几乎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是精华,而肯定认为是糟粕无疑了。事实上,自戴震批判宋儒“以理杀人”特别是自五四以来,在批判传统的思潮中,宋明理学中的这个命题首当其冲被作为糟粕而无不欲扔到历史的垃圾堆而后快。但“存天理去人欲”真的是糟粕吗?这里面包不包含精华的成分呢?这里面有没有误读呢?笔者可以肯定的是,误读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是比较严重的。

误读之所以存在,也就在于思想在历史的传衍中,不同时代解读的立足点和侧重点会发生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仅取决于思想的内在逻辑,而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往往在社会剧变之际,这种思想的误读就更为明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李贽、陈确、戴震等人对私的肯定,对宋儒“以理杀人”的批判,就代表了对这一命题的最早解读和诠释。这些思想变化与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明朝灭亡等多重因素有关;而五四以来对“吃人的礼教”的批判,正如前文所析,是中西文化碰撞后的一种应对社会

^① 萧蓬父:《传统·儒家·伦理异化》,载《萧蓬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现实危机的剧烈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期，在学术研究中又受到唯物唯心的对立和阶级斗争论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时期，对天理人欲之辨的误读是比较突出的。

这里我们仅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来稍作说明。由于对唯物唯心的机械教条理解以及受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天理与人欲这对范畴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比如，在哲学上，认为“理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天理人欲的争辩，也是一个重要的题目”^①。以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待天理人欲的关系，如“封建统治阶级所虚构的特权法律、军事裁判权和等级制度等便是‘天理’，而反对封建制度（即所谓‘次等’）的任何意念都是‘私意’，这种荒谬绝伦的理论的反动性是极其露骨的。”^②“理学家把‘天理’和‘人欲’说成是‘不能并存’、‘不容并立’的，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为都说成是‘人欲’，是违背‘天理’的，是罪恶的，这首先是针对农民‘均贫富’的要求。”^③这一时期的观点认为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是精神和肉体、物质的关系，将“存天理去人欲”理解成一种僧侣主义，如“朱熹主张的天理人欲之辨，最集中地表现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僧侣主义实质”^④，“所谓以‘道心’主宰‘人心’，便是以天理克服人欲、以精神控制肉体的僧侣主义命题”^⑤。“他们把天理与人欲对立，以为人身为人欲罪恶自私的根源，结果，必然和释氏走向一条路去。所以说他是僧侣主义，即在此。”^⑥。上述观点的意识形态意味极重，扭曲了天理与人欲的历史内涵，遮蔽了天理人欲之辨的本来面相，可以说误读是相当严重的。

当然，任何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也都包含着误读的可能性。因为诠释者和所诠释的思想文本与思想命题之间肯定存在着时间差，所以解释者很难摆脱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39 页。

②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81 页。

③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版，第 546 页。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58 页。

⑤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33 页。

⑥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38 页。

自己的前见,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①，“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②那么,前见从何而来呢?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受到效果历史意识的影响,他说:“当我们力图从对我们的诠释学处境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历史距离出发去理解某个历史现象时,我们总是已经受到效果历史的种种影响。”^③也就是说,前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解释者受制于历史距离从而以此观彼,所以在诠释者眼中所看到的更多是思想在历史中所产生的效果或者说在历史发展中呈现的思想,解释者一开始就带着某种效果历史意识。解释者的目的在伽达默尔看来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他说:“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这种视域融合随着历史视域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域。我们把这种融合的被控制的过程称之为效果历史意识的任务。”^④伽达默尔所说的是前见和效果历史意识的积极意义。视域融合是思想在诠释中得以推陈出新的重要条件。在视域融合中,要正确看待前见的问题。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任何诠释都是有前见的,但合理的前见恰恰是诠释的前提。那么,何谓合理的前见呢?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然而这种问题意识只能作为我们关注某个理论问题的背景,当我们具体深入到问题的诠释时,我们就必须要对“古为今用”或者“以今释古”保持足够的警惕,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意识不能影响到“入乎其内”而得其原味。好比我们要引水,必须先找到真正的水源地同时要保护好水源地,不能以下游的泥沙杂物而混合之。

当然,要实现真正的视域融合,必须建立在对古典思想的一种内在性理解之上。也就是说,要实现真正的视域融合,首先必须要警惕古今视域的互相排斥,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的诠释来说尤其如此。所谓古今视域的互斥,主要是以现代性视域来解释传统经典中的概念,以现代性立场对传统经典中的思想命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题进行一种“未入乎其中”的外在批判。所谓“未入乎其中”，也就是建立在一种历史的想象之上，没有深入到古典思想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和思想渊源，以现代社会的种种特征去想象或者同构古代社会的种种特征。就拿“存天理去人欲”来说，如果以当代社会普遍的人或公民社会的特征去想象宋代，很容易认为“存天理去人欲”是针对所有阶层所有人而言的，而且有可能认为这是理学家为皇权代言从而压制百姓生活欲望的一种观点。这种理解就是典型的“未入乎其中”的外在理解，这种理解显然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真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恰恰相反，理学家当初提出“存天理去人欲”针对的正是皇权本身，这个命题的提出正是为了限制皇权的。皇帝以及为官者的“存天理去人欲”正是为了实现民之大欲。从上述例子看来，在经典诠释时，在实现视域融合之前，首先要努力排除古今视域的互斥。这种互斥主要是以今观古，从而以今释古，以今责古。

那么，在克服古今视域互斥，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更好地更准确地理解经典的思想内涵呢？到底该如何发挥解释学在经典诠释方面的助益呢？陈乔见博士认为，西方“诠释学循环”的原则可以为我们的经典解释带来帮助。^①所谓“解释学循环”，也就是：“我们必须从个别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从整体来理解个别。”^②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能以个别字句片面地代替整体，也不能以整体涵盖个别的差异。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存天理去人欲”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命题，可以说是个别，而宋明理学是整体。一方面，对“存天理去人欲”这个个别命题的理解不能脱离宋明理学的整体语境和理论指向，也就是要阐明理学家为什么要提出天理人欲之辨？^③另一方面，在把握了宋明理学的整体语境之后，还要对天理人欲之辨的提出和发展脉络予以具体性梳理，对不同思想家天理人

① 参见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页。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③ 天理人欲之辨不能化约为理欲之辨，这一辨包含天人关系和理欲关系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理不离天，欲不离人，离开了天人而谈理欲，此理对人来说便成为一种“外铄”的东西了。因此本书只称天理人欲之辨而不称理欲之辨。